

# 欧阳修与《新五代史》

□ 陈晓华

## 新《五代史》的撰修

宋人虽然没有一统江山，但在文化方面却表现出睥睨过往的霸气，他们要开出儒学新气象、欲一统文化的新江山。他们的自信使他们一定要确立自己的文化高度及其话语权。而欲为此，鉴往知来就显得非常重要。鉴往知来的发抒佳所，就是史书。故而，宋人修史的热情极高。就正史而言，前人已官修有一部不错的唐史，他们却偏偏还要官修一部。本朝开国已官修五代史，官方虽然没有出面组织重修，但对宋室千秋有着无比自觉的责任，以宋文化为己任的欧阳修却不辞劳苦，以一己之力再修了一部五代史。这三部史书，一定程度上为宋人确立新的文化高度，建立自己时代的话语权起了示范作用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三部中的两部再修之史都出于欧阳修之手，并且为区别前修，它们日后都被冠以了一“新”字。

在参与主持编修《新唐书》前，欧阳修就已开始撰写《新五代史》了。并且在《新唐书》完稿之前，他的《新五代史》已经写完了。不得不佩服欧阳修精力过人，以及对修史非同寻常的热爱。不过，我们要知道，欧阳修参与编修《新唐书》，是在《新唐书》开修10年之际，以《新唐书》庆历四年（1044）开修、嘉祐五年（1060）告成，《新五代史》景祐三年（1036）之前着手编写、皇祐五年（1053）基本完成来看，欧阳修至少有18年的独立时间，从容修撰《新五代史》，不受主编《新唐书》公事的烦扰。所以，有充裕修撰时间的两部史书，没有因出于一人之手而影响到质量。甚而可以说，《新五代史》未雨绸缪于欧阳修可以修《新唐书》之前，并为之定下了基调。

## 《新五代史》春秋笔法

与《旧五代史》相比，《新五代史》别有新意。十国之名即它首创。此外，《旧五代史》，以中原建国的各政权为正朔，按照史之常例，依他们建国先后为序撰写各朝史，中原之外各政权，仅为之依类作传，以示正闰之别。《新五代史》则一反惯例，把五代作为一个整体，分本纪、列传、考、世家、附录五部分来写。五代在中原建国的各朝本纪写完，再进入各朝列传。列传分门别类，匠心独运。其中，以唐六臣传承上启下见五代之乱的肇始，义儿、伶官、宦者三传见唐祸的延续。杂传收不便列入他传者以成就列传的全面性。其中义儿传尤具时代性，是唐五代时期的特殊产品。

十国无论建国或称臣者，都降一等入世家。不过十国中有些王朝日后倒真与世家之称名实相副。当然，这个世家已转而

为文化世家了。如吴越钱缪，其家族就演为文化世家。这其实是五代君臣也未曾不如宋朝积极，在立国后都致力于建设自己文化高度及话语权的明证。五代建国者多出身草莽，他们遗憾自己未有少习礼仪文明的机会，在取得政权之后，大多颇留心笼络勋旧世家，以建设礼乐制度。同时，也加强下一代的教育，以培养能倡扬礼乐文明，能承担起为文化续脉重任的接班人。如后唐庄宗李存勖、南唐李后主，都是成功教育的范例。

如此谋篇布局，欧阳修可谓用心良苦。衰乱的五代各朝在欧阳修眼里算不得正统之朝，统归起来视作一体，更符合五代各朝国祚短、特质类似的实情，并且更便于总领纲挈，集中体现自己的寄予之旨，展示垂戒之意。他为后唐宗室设唐太祖家人、唐明宗家人、唐废帝家人三传，以此表明朝代名称没变，但血统已更，正统也就无存。传达自己明血统固正统，以使国家传之久远的观念。其本在否定唐五代的义儿制度，建立宋朝的文化政治。不过，这似犯了宋太宗的忌。但宋太宗上位，于正统早就安排得天衣无缝，本就正统，何来违碍。道统至上的欧阳修不会糊涂到既为自己朝代树标立杆，又毁自己朝代的根基，在正统上令自己朝代蒙羞。另外，五代礼乐制度，在他看来，有等于无，本可不写，但他依然为之撰司天、职方二考。像为宋太祖讳，不为反对陈桥兵变、本该立传的韩通立传，等等，显然都是春秋笔法的表现。

如此撰史，且全书常有表现，确已突破常规，借史寓褒贬的用意表露无遗，实春秋笔法之妙用。

## 新旧《五代史》

因不为韩通立传，《新五代史》被宋人降格为二等文字史书。当然，这并非是说《新五代史》文字逊色，而是指《新五代史》缺乏史家才学识，为二流史书。因为史家最可贵的是实录精神。

对于《新五代史》的批评，除批评春秋笔法滥觞之外，还有如王安石等遗憾欧阳修不甚读书或不学。不甚读书，就是读书不到家，没读懂读透。不学，就是不术，即无研读纂修史书之术。总之，都是在讲欧阳修缺乏史家才学识。其实，这都是“议论”惹的祸。正因为全书充满议论，不啻于说教，道学之气也未免过浓。顾炎武、钱大昕等因此认为欧阳修迂腐，既撰史书，却不注重史实，好议论，读来生厌。章学诚则视之为哀婉吊祭之作，无有史才。诚然，《新五代史》多发议论，道德教化满篇不假，但它的议论与说教并不可厌。比较而言，主笔多为旧朝入新朝之人的《旧五代史》，离旧朝不远，对前

朝感情复杂，余悸未消，有过去时代的包袱，对个人命运也有把握不牢的惶惶之感；加之其笔多为速成，多照抄实录范质《五代通录》，书中自然常有天命之叹，也颇有溢美回护与不实。

自撰《新五代史》的欧阳修则充满自信，一身轻松，不需要溢美回护，也不必俯首天命，加以励志的个人经历，面对是非得失，自然以人事定而不假手天命。像《伶官传序》短短一句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！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，与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”，文约不乏激昂，哀婉不失激扬，一气呵成，发人深省，给人启示，催人奋进。五代，这个英雄豪杰、奸佞懦夫、正义邪恶一起登场的时代，既有英雄末路的悲歌，奸佞媚世的丑恶，生于乱世的无助，也有脉脉温情，功业、理想与激情。这一切，经欧阳修大笔，至今读来栩栩如生。

由此可见，欧阳修本就借助《新五代史》吊祭哀婉前人，鉴戒后人，何可厚非。清人宋人之间，学风有别，但学术分歧本不该累及史书曲直，清人也本不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宋人，何来生厌。

当然，也正是因为好议论，《新五代史》不甚经意事实，在史料方面，虽增引了不少笔记、小说、野史等，扩充了史料，但有的未加鉴别就入史，造成了失实。此外，为了欧阳修简约有法的文学理想而进行的删繁就简，使不少具体史料被裁剪，也是不足为训的。当然，《新五代史》并非全不择别史料，它也订正了《旧五代史》不少错误。也增加了不少《旧五代史》未见的史料，如《五代会要》《五代史补》等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以《左传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做比来评价二书，指出《旧五代史》好比《左传》，《新五代史》则如《公羊》《穀梁》。《左传》优在叙事，《公羊》《穀梁》长在微言大义。亦即，《新五代史》并求语言的含蓄微妙与义理的精深切要，看重历史阐释“道”的功能，欣赏其可为当世鉴借的功效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比，不无道理。薛居正所修匆匆，基本上照搬实录，无疑多在叙事，确如《左传》。由一代文宗欧阳修执笔，时间充足，目标明确的《新五代史》，自然发凡起例。褒贬归《春秋》，叙述归《史记》，义例谨严，寄寓深厚，高洁有致。实践了他“道胜者，文不难而自至”，“道纯则充于中者实，中充实则发为文章辉光”。

的确，以崇奖道为己任的古文运动先驱欧阳修为避免不了为文，也离不开议论。这反而成就了《新五代史》，其文史相得益彰，堪称媲美《史记》。

## 经史窥望

无论造纸还是印刷，中国都曾是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发祥地之一。在这一文明的进程中，蜀地曾写下中国印刷史极为重要的一页。

近现代出版业巨匠张元济在1939年6月出版的《图书季刊》上发表的《实礼堂宋本书录序》说：“越八百余年雕版兴。人文蜕化，既由朴而华，艺术演进，亦由粗而精。故昉于晚唐，沿及五代，至南北宋而极盛。西起巴蜀，东达浙闽，举国临官廨、公库、郡斋、书院、祠堂，家塾、坊肆，无不各尽所能，而使吾国文化，日趋于发扬光大之境。”在张氏的这段关于中国印刷史对中国文明重要作用的阐述中，有一个关键点讲的是：中国已有的800多年的雕版印刷起于“巴蜀”。张氏的这一观点，并非张氏一人所据或一人所创，而是历史的事实，也是研究中国印刷史有识之士的共识。现代佛教学、版本学大家吕澂在1943年3月出版的《雅言》上发表的《宋藏蜀版本考》里说：“宋版释藏始雕于益州，通称蜀版。”在这篇文章中，吕氏详尽地考证了佛教典藏始刻于蜀地的五个不同的版本，包括淳化本（990—994）、咸平本（998—1003）、天禧本（1017—1021）、熙宁本（1068—1077）和崇宁本（1102—1106）。此五个版本均属北宋时期的雕本。赵宋一代鼎新初始即开宝四年（971），宋太祖赵匡胤便敕令益州（今成都所在地）雕刻《开宝藏》。这时距宋朝建立（960）刚刚过去了11年。

为何要在蜀地印制如此浩繁的佛教经典，而不是在宋朝京城开封呢？

这当然要提到一位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人物：毋昭裔。毋昭裔本是河中龙门（今山西运城）人，很是博学，又以才闻名。晚唐时期，各地纷争战乱，毋昭裔一次与时任后唐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偶遇，成就了他后来在仕途和印刷史上的辉煌。孟知祥建立后蜀（934—966）后，起用毋昭裔为御史中丞；孟知祥死后，其子孟昶继位，又拜毋昭裔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毋昭裔成了后蜀宰相。毋昭裔并非从小立志做官的人，他原本是一读书奇人。他既嗜好藏书、酷爱古文，又精通经术佛理。由于早年家贫读书寻书不易，于是在未发达时立下誓言：“他日若我富贵了，就印刷雕刻，留给学者后人！”果然，在后蜀发达后，毋昭裔践行了自己的诺言。他最先拿出自己的钱财（据说上百万），印行四书五经颂后蜀各郡县，后又叫门人句中正、孙逢吉等印行《文选》《初学记》《白氏六帖》。重要的是，毋

昭裔的这些刻板被带进了宋代。可以说，毋昭裔不仅是第一个用私人财产刊刻书籍的人，而且是整个蜀地宋刻的奠基人。于是有了吕澂所说和考订“蜀藏”的印行源流与始末。首先板印的大藏经，自宋太祖于开宝四年（971）敕令益州刻印始，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（982）完成，历时12年。这部释藏典籍，刻板多达13万块。吕氏说，得益于蜀版释藏，“自后，丽、丹、闽、浙诸刻皆导源于此”。

宋蜀刻，虽源于释藏，但决非只有释藏刻印。除了释藏之外，宋代蜀刻包罗万象。宋代四大部书，似乎除《太平广记》外，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《册府元龟》属蜀刻无疑。方文皋在1942年6月的《教育学报》发表的《〈册府元龟〉版本考》中说，《册府元龟》虽先有写本（祥符六年即1013）呈送崇政殿，很快便有刻本印行。据民国第一藏书家傅增湘考证，《册府元龟》的初刻就是蜀刻。据傅增湘1940年《藏园群书题记》说，《文苑英华》，初刻也在“蜀中”。《太平御览》一直认为以“南宋闽刊本”为最古，不过，张元济1928年在日本发现了“南宋蜀刊本”。就此可见，宋刻初始的大部头书，大都出自蜀刻。而且如吕澂所言，先有蜀刻的释藏本，才有随后的丽、丹、闽、浙本。不仅仅释藏如此，其他的一些古本，也是先有蜀刻后才有他刻。傅增湘说，《文苑英华》宋刻后，直到明代隆庆元年（1567）才又重刻。也就是说，待《文苑英华》再刻时，距宋蜀刻，已经过去了整整400年时间。我们知道，“宋四大书”都属浩如烟海的大部头，如《册府元龟》作为“四大部书”之首，《太平御览》1000卷，1690余种（今不传者十之七八）；《册府元龟》1000卷，31部、子目1104门；《文苑英华》1000卷。足见当时蜀刻规模何等宏大。这包括与此相适应的抄写、刻工、用纸（包括造纸）、印刷、装订、发行等一系列与书相关的制度、事件和人物，多大的复杂和壮观。除了释藏和部书外，蜀刻还刻印其他种类的书籍。经书如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音义大字本，最先也是宋代蜀中所刻。李白，作为唐代第一大诗人，其生时便有文集存世（《旧唐书》说李白“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”），不过以刻本方式存世，是在宋代。《李白集》的第一个刻本虽不是蜀刻，但是，第一个刻本“苏本”（宋元丰三年苏州太守晏知止所刊），现已无存。现存世的最早版本，是北宋时翻刻苏本的蜀本。关于李白集版本的由

来，现代治李白专家詹锼1943年8月在《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》上发表的长文《李太白集版本叙录》里有详尽的考订。唐人诗集第一个“全集”式的刻本《唐六十家集》，也出自宋蜀本。据称出自《唐六十家集》中《孟浩然诗集》（共集孟诗214首），是孟诗集现存的唯一孤本。这一孤本先由傅增湘收藏，不知何故，1941年收进了美国国会图书馆。这一切都表明，两宋，尤其是北宋，蜀地是整个中国的刻印中心和刻印重镇。随便一说，经元、明两代，中国的印刷中心和重镇转移到了浙、闽。但浙、闽的源头在蜀地，则是毋庸置疑的。而且，两宋蜀刻，其刻书籍的种类洪丰与包罗万象，还在于蜀刻的认真、精湛而影响后世。正如冯璧如1942年3月在《图书集刊》上发表的《宋蜀本古今注校记》所说：“涵芬楼影印宋本古今注……（所依两刻）皆在蜀中，相去数十年，同一地遂有两刻，斯诚言蜀本之盛事也……俾蜀本之真，得以有传。”

由此可观，宋代蜀刻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地位和业绩，曾经是何等辉煌与灿烂。



### （上接1版头条）

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治水。水是重要的自然资源，有其自身运行的自然规律、生态规律；水进入了人类社会，治水活动又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。自古以来，人类治水实践就是不断发现规律、认识规律、遵循规律、利用规律的过程。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对经济规律、社会规律、自然规律、生态规律认识不够，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生态环境承载能力，造成水资源短缺、水生态损害、水环境污染的问题不断累积、日益突出，成为常态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、科学治水，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，搞清楚工作的全貌和真相，搞准确问题的本质和规律，准确把握局部和全局、普遍和特殊、主要与次要、偶然与必然、当下与趋势的关系，统筹处理干流与支流、上游与下游、左岸与右岸的关系，切实把把脉、问症结，为认识当下、规划未来、制定政策找到客观基点，不断提高水利工作的科学性。

以真抓实干的韧劲治水。我国自然地理和气候特征决定了水旱灾害长期存在，并伴有突发性、反常性、不确定性等特点。古往今来，治水兴水艰苦卓绝，古有大禹治水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李冰父子“利济斯民”“利济全川”，今有杨贵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，中华儿女抗击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坚韧不拔、顽强拼搏。水利人的事业是奉献的事业，水利人的精神是实干的精神，这种真抓实干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应继续发扬光大。特别是面对新老水问题复杂交织、水安全已亮起红灯的严峻形势，新时代水利工作更加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真功

夫硬功夫，不做表面文章、不搞花架子，以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的韧劲落实水利工程补短板，以刀刀向内、壮士断腕的决心落实水利行业强监管，将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变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。

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治水。过去，人们对水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防洪、饮水、灌溉。现阶段，人们对优质水资源、健康水生态、宜居水环境的需求更加迫切。从低层次上的“有没有”问题转向高层次上的“好不好”问题，人民群众对水利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，但水利事业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。问题是实践的先导，创新是发展的源泉。水利实践无止境，水利创新无止境。新时代水利工作需进一步解放思想、开拓进取，全面推进理念思路创新、体制机制创新、内容形式创新、方法手段创新，重点补好防洪工程、供水工程、生态修复工程、信息化工程方面的短板，重点加强江河湖泊、水资源、水利工程、水土保持、水利资金、政务行为方面的监管，建立完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、水资源配置体系、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、水利行业监管体系等四大水安全保障体系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水利现代化道路。

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。新时代水利精神不是从天而降，不是简单口号，而是传承于五千年治水文化，立足于新时代水利实践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水利行业的具体体现，也是水利人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标尺。我们将弘扬“忠诚、干净、担当，科学、求实、创新”的新时代水利精神，汇聚水利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，创造水利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### （上接1版二条）

革命理论一经被群众掌握，就会焕发出巨大力量。信念的坚定来源于理论的自觉。只有深入学习领会革命的理论，才能进一步增强对党的领袖的爱戴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，才能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、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真正带着使命、带着责任、带着感情学深悟透，切实增强政治认同、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，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心、对人民的感恩心、对事业的进取心、对法纪的敬畏心，以理论的清醒自觉确保政治的坚定过硬。

## 深化运用红色资源必须弘扬革命精神

习近平总书记对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都作过精辟的概括。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，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，我们要始终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、实事求是闯新路、艰苦奋斗攻难关、依靠群众夺胜利，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。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，在建立红色政权、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，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、求真务实、一心为民、清正廉洁、艰苦奋斗、争创一流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

区精神。

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就是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从中蕴含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政治信仰。许多早期共产党人并非出身贫寒，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，毅然选择了遍布荆棘、腥风血雨、随时牺牲的人生道路，为革命忠贞不屈、前赴后继。当年任莲花县委书记的刘仁堪被敌人割掉舌头，用脚趾蘸着鲜血写下了“革命成功万岁”几个大字；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的江善忠，诱敌上山后咬破手指，在衬衣上留下“死到阴间不反水，保护共产党万万年”的血书，跳崖牺牲。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和真实写照，是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强大精神支柱。深刻领会和把握从中彰显的勇于牺牲奉献的忠诚政治品格。井冈山斗争时期，牺牲的烈士达48万人，留下姓名的仅有15744人；赣南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2万人，涌现出瑞金沙洲坝杨善一家“八子参军，壮烈牺牲”、兴国高兴乡邱会培一家12口“全家革命，满门忠烈”等感人事迹；“万里长征路，里里兴国魂”，兴国成为全国烈士数量最多的县。深刻领会和把握从中体现的艰苦奋斗的责任担当。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时期，党和红军面对强敌的疯狂“围剿”、面对艰难险恶的环境条件，从不畏惧、毫不退缩，用

百折不挠、前赴后继、艰苦奋斗的精神顽强拼搏、勇闯新路。他们打响武装革命的第一枪、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、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等，这些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诸多第一，推动了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和根据地的蓬勃发展。

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在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，要战胜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，就不能丢掉先辈先烈对党忠诚、不畏艰难、勇于斗争的风骨、气节、操守和胆魄。发扬斗争精神，勇于攻坚克难，主动担当作为，为强军兴军作出应有贡献。

## 深化运用红色资源必须永葆革命本色

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。我党我军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，好作风、好形象既是党的性质宗旨的生动体现，也同样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、战斗力、影响力和感召力。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时期，党在严酷的斗争实践中培养养成了艰苦奋斗、廉洁自律、理论联系实际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，当年苏区流传的民歌就是最真切的写照。

进入新时代，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些革命本色和优良作风。一是密切联系群众、一心为民服务，把“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

命的群众”看作是“真正的铜墙铁壁”，苏区人民曾发自内心的称赞说，“共产党真好，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”。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这也是此次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所在。始终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二是领导模范带头、团结凝聚力量，毛泽东、朱德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，官兵平等，凝聚起坚不可摧的革命力量。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苏区干部好作风，坚决摒弃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，切实发挥“关键少数”的关键作用。三是坚持真抓实干、勇于争创一流，广大党员干部以蓬勃的革命热情、昂扬的革命斗志，深入群众、深入一线、深入实际，扑下身子干工作，一切为了前线，一切为了苏维埃，在政权建设、经济建设、扩红运动、动员支前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

新时代要有新气象，更要有新作为，我们要用不懈奋斗、开拓创新、责任担当，续写新的辉煌。我们要从红色传统中汲取清正廉洁的正能量，回归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，以政治建设为统领，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政，勇于自我革命，始终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挺在前面，自觉强化自律意识、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，自觉主动接受监督，把自己搞得清清爽爽、干干净净，立起党员干部的好样子。

（作者系江西省军区副政委员）